

【中共党史研究】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历史契合点及其当代启示

——20世纪初“社会主义论战”的再审视

李萍 张冠

【摘要】中国共产党人选择并接受马克思主义有三个重要的历史契合点：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积贫积弱、民族危亡的问题，即要让多数人都过上真正“人的生活”，马克思主义为之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二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与“社会主义”理想的契合。西学东渐以来对于西方文明批判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国内的传播以及俄国的革命实践，完整地构成了早期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契合点；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基本价值的契合。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崇尚贵公”、“超越性、理想性气质”和“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等基本价值，这与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原则、共产主义理想和实践唯物主义特质，具有某种契合性。

【关键词】社会主义论战；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历史契合点

【作者简介】李萍，哲学博士，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哲学系教授；张冠，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哲学系（广州 510275）。

【原文出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70～7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研究”（16JJD71001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思想史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至上价值研究”（20AZD004）。

20世纪初的中国充满危机和苦难，各种思想思潮交汇、交锋。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初始，就选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追求社会主义理想伟大实践的指南？本文试图通过对20世纪初“社会主义论战”的再审视，揭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契合点及其当代启示，这对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价值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

从中国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的维度不难发现这样两个重要的事实：“社会主义论战”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个被高度关注和影响深远的主题，也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认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来源；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面对民族危亡、民不聊生的积贫积弱之现实，如何救中国以及寻找变革、改造中国社会的一条新路，是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选择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马

克思主义的历史契合。

1920年11月,张东荪在《时事新报》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拉开了关于社会主义论战的帷幕。在论战中马克思派和改良派的分歧正是起于当时中国人的生活状况。张东荪直言,“有一部分人住通商口岸,眼所见都是西洋物质文明的工业状态,于是觉得西方人所攻击西方文明的话都可移到东方来,而忘了内地的状态和欧洲大不相同”,并认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据此,他提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发展实业,增加富力,这样才能让大多数人过上人的生活。针对论战的不同主张,张东荪强调,当下中国“所急者乃在救贫”而致贫的主要原因有二:远因是“物产未被开发”,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莫甚于企业者之不道德”;近因是“外货之压迫”,欧美各国是为资本之阶级国家,此种资本家利用国力以征服弱种;“中国至今日所以愈加贫困者,尤在近因”。^①总体来看,张东荪等改良派对解救中国危亡的基本倾向是十分明确的: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危亡,主要是由于深受欧美资本主义入侵的压迫所致;现实的路径首要是实业救民;不能走欧美资本国家的资本主义道路,正可谓“欧美之资本主义不倒,则中国永无翻身之日”。^②但也不适宜用革命的手段搞“社会主义”。

以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共产党人为代表的马克思派,对于张东荪等改良派所指出的大多数中国人尚未过着“人的生活”之现实并不否定,或者说在这点上“未尝无同感”。陈独秀认为,张东荪所言“中国除了开发实业以外无以自立”,“非常中肯又非常沉痛”。显然,在中国大多数人尚过着民不聊生的非人生活之现状以及迫切需要发展物质文明以解决百姓穷困生活窘境的问题上,马克思派与改良派是高度一致的,但马克思派明确提出了以下三个重要的论点和主张:

第一,只顾增进物质文明,却不讲适当方法分

配物质文明使多数人能享物质文明的幸福,结果物质文明还是归少数人垄断,多数人仍旧得不着人的生活。陈独秀例举了诸如开发煤矿、修建铁路等物质上的大工事,工人并没有因此减少生活的苦痛,反而矿坑烧死了几百名工人,铁桥压死了几百名工人。如果不修这些大工事,“这几百工人或者还不至一齐惨死;可见只知开发物质文明,却不用有益于多数人的主义去开发……也不能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③

第二,要用适当方法去分配物质文明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陈独秀在复张东荪信时直言道,按资本生产制一方面固然增加财富,一方面却增加贫乏,这是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的。多数人过不着人的生活,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制下必然的状况,不是资本家个人的罪恶^④。陈望道在批评改良派“实业救国”之见时,亦坚定地相信并强调,只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才能解决大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改造人的全体生活的问题。

第三,中国社会的贫乏、中国多数人过着非人的生活,固然逃不出欧美资本主义制下机器工业发展必然造成的多数失业及物质昂贵的公例,但中国的状况不仅有此因,而且中国官僚武人与绅士土豪互相结托的资本主义,比各国纯粹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还要厉害。多数人得不着人的生活,到底仍免不了社会革命。^⑤可见,早期共产党人对解救民族危亡的基本取向亦是非常明确且针锋相对的: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对人民的苦难感同身受,力图采取各种方式增加物质文明,以改变多数人得不着“人的生活”之状况。但这只是基础,而且仅是一个方面。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积贫积弱、民族危亡的问题,必须从制度上解决,即要让多数人都过上人的生活,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制度;同时,既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又要反对封建主义的束缚压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

派与改良派分道扬镳了。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确实面临民族危亡的深重苦难。在1923年展开的“人生观论战”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回应:胡适在对欧洲人文主义传统进行了不屑一顾的讽刺之后,认为“玄学鬼”根本动摇不了欧洲科学“根深蒂固的地位”。而“一到中国,便不同了。中国此时还不曾享着科学的赐福,更谈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我们试睁眼看:这遍地的战坛道院,这遍地的仙方鬼照相,这样不发达的交通,这样不发达的实业,我们哪里配排斥科学……中国人的人生观还不会和科学行见面礼呢!”^⑥内忧外患、积贫积弱成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缩影,这也是科学派所言之“事实”,是他们批判“玄学”派的重要“武器”。

中国共产党人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及社会主义理论,将其作为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指导思想,正是顺应了当时中国社会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诉求。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正是契合了中国共产党人要通过彻底改变旧社会使多数人过上人的生活之迫切需要的使命。这种契合不仅是一种历史必然性,而且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宗旨一致,“初心”与“使命”便成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理想与实践。

二、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与“社会主义”理想的契合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正如前所述,20世纪初,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认识、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从直接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开始的,而是从中国的社会现实之迫切需要出发的。回溯历史,主要有三个路径背景:

其一,1840年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西方宗教、科学、技术、制度与文化等所谓的“资本主义”文明随之汹涌而至。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分析道,当时不少仁人志士在反思中国政治、文化危机时,逐渐祛除了“天朝上国”的优越感,转而

掀起了“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的西学东渐浪潮。^⑦于是,一时间无论是洋务派、维新派还是革命派,改良派还是马克思派,都把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文化、制度看作是中国救亡图存之关键。与此同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正处在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阶段,以银行业、股份等为特征的金融业的发展,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变化,不仅扩大强化了垄断资本组织,而且使资本主义国家在拥有政治职能的基础上拥有了经济职能,为西方资本主义借助国家的力量向外大规模扩张提供了强有力的条件,也使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更加激烈。在某种意义上,这为西方社会无产阶级力量的崛起提供了舞台,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对理想社会的“预见性”获得了一种现实的强烈回应,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在欧洲相继而起,社会主义思想亦夹杂在西方理论中传入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运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只言片语正是在此背景下被译介到中国”。^⑧换言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世界内部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反思中,在西方世界介绍或描述社会主义运动中,从接触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一些基本术语、概念和思想开始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背景隐含了当时中国社会各路精英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术语概念是与马克思主义相联系的,正如李达所指出的:“马克思学说出世以后,从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变而为科学的社会主义;于是社会主义就为马克思主义所代表,一说社会主义,就晓得这是马克思主义了。”^⑨而且,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明的有机部分,各种流派从不同角度和方向或多或少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思想。从这样一个历史契合点观之,一方面,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的接受和向往主要是急于为改变旧中国

寻找方向,但对马克思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的认识还处在较为粗糙和表面的阶段,特别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这样一种美好社会理想的基础、本质、规律,尚存在较大的局限性,这也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实践中走了一条极其艰难曲折的道路得到某种解释。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真正具有了回归马克思并自觉探索的开创性意义。

其二,随着西方经济贸易的东进,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去东洋西洋留学,带回许多新的思想,由此中国开始了现代教育。正如贾祖璋在分析这段历史时指出,“在那些年,教育最明显的特点,就是青年最担心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一事。不管是正式教育或非正式教育,很明显的是,不再重视宣讲儒家的教条,而在力求了解自19世纪半以来吞灭这古老帝国的大灾难的原由。”^①“五四”反帝反封建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深刻地展现了这样一种新生的力量。

有学者在考察社会主义概念在中国的传播时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传播主要是以中国留日学生为媒介,以日本为主渠道的。事实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先进分子均曾在日本留学,日本社会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术语的使用以及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留学生。1903年以前,中国知识界主要将日文中“社会主义”挪用到中国语境,而1903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才开始在影响较大的报刊、辞典中对社会主义、主义、社会主义这样的术语进行阐释。^②这个分析有相当充足的历史依据。

在20世纪初专门解释西方术语的中文辞书《新尔雅》^③中,关于“社会主义”的阐释是,“废私有财产,使归公分配之主义,谓之共产主义,一名社会主义。”^④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办的很多报刊都致力于介绍新思想,培养新的社会意识,“社会主义”

一词频频出现,甚至成为一种“时尚”。一方面,新文化运动以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改造中国社会的新学说,其定义、真意、目的以及与其他主义的区别等被充分讨论,社会主义概念在中国逐渐得以“普及化”。另一方面,当时对马克思“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的理解和认识还是比较多元混杂的。正如陈独秀在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中所指出的,现今尚留存的、有力量的社会主义有五派,其中重要的是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这三派。至于哪种社会主义理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时的认识是模糊且泛化的。

有学者考察指出,在日语语境中,“社会主义”是明治时代的产物。1870年,日本德文翻译家加藤弘文、西周等在其《真政大意》、《百学连环》等著作中以经济学的形式介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当时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解读主要是负面性的,多为危害、激进行动的“邪说”。1878年6月6日,福地源一郎在《东京每日新闻》上首次用汉字“社会主义”对译“Socialism”,在这里,“社会主义”主要与“个人主义”相对,大体指“将社会置于中心地位的主义”、“集体主义”。^⑤可见,当时对社会主义的概念、学说不仅模糊泛化,而且日本文化下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和欧洲的社会主义也有不小区别。瞿秋白曾直指,一些人虽对社会主义的讨论有无限的兴味,但对社会主义含义及流派的理解却像“隔着纱窗看晓雾”。李达在论及马克思派社会主义时,也表达了这样的看法:“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究竟是包含一些什么主义,恐怕还有一些研究社会主义的人弄不清楚的。他们自己要提倡马克思派社会主义……倒反指摘别人所提倡的马克思主义为过激主义……也许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派别所致”。^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成为那个时代先进青年、志士仁人的追求和希望。

其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通向光明的现实样板。如果说之前对社会主义的讨论还只是一种对社会主义理论、学说纷

争理解的话,那么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之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二个无产阶级政权和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对正在苦苦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的共产党人无疑直接树立了一个实践的典范。正是这个榜样,使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能够使大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的理想社会之图景,促使并坚定了马克思派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信念和实践的开启。毛泽东指出:“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⑧。换言之,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传播和俄国的革命实践,完整地构成了早期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契合点。

诚然,在经历了洋务派、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开出的各种药方后仍然无果的中国社会,的确亟需一种能够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武器,其间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一个极其艰难曲折的探索过程:中国先进分子虽然痛恨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但在效法西方的过程中,起初还是对其制度充满渴望的;当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传入中国,俄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的制度、改造中国社会的方向及道路,也同时当作一种现实的“实践方案”,因此不免有脱离中国社会实际、急于求成的简单化追求。譬如当时马克思派的主流倾向是认为,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这两大原则就是现实社会中万恶的根源,“是流行世界的瘟疫。”^⑨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之,当时这种思想倾向显然包含了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认识的误区。这一误区的焦点问题是,在马克思的学说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理想的社会形态,而这种“理想”是在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进步性的肯定和对资本主义本质批判的基础上建立的,忽略这个基础和过程,直接把理想作为现实“实践方案”,其后果也致使中国革命的道路走了一些弯路。经

过艰难的实践,马克思主义者逐渐清醒地认识到,“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⑩这个认识过程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在社会实践不断深化的;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与完善的过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深入发展的过程。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基本价值的契合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中国人深层次的社会基因,并构成中华民族精神追求的基本定力。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诞生在欧洲,但并没有深刻地影响、改变欧洲社会,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却如此地受欢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得到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从接受主体的文化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基本价值具有某种契合性。

第一,“贵公”作为中国社会主流的伦理价值取向,与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理想具有某种相似性。“贵公”是中国伦理道德传统的核心元素,作为中国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行为选择,表意着中国文化独特的伦理精神。“贵公”伦理文化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的不同时期虽有不同诠释和深化,但“公”之“贵”意,始终没有改变。有研究者从“贵公”思想历史嬗变的角度做过这样的梳理:“贵公”思想始于中华文明的上古时期,“公”的初始涵义从原始“共同体的价值需要”到对占有支配权力首领式人物的“道德期待”的发展过程,明显表现出“以公为尊”的价值观念;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先秦时期“贵公”获得了明确的“道德概念”之身份。“贵公”思想经宋明理欲之辨,获得“天理”之义,具有超越性的道德价值;明末清初之际,通过“聚私为公”理论论辩,使传统“贵公”思想的伦理主体发生了重要转向及重构;随着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开启,

经过多次思想论战的深化反思,更加确证了在“公私相利”的价值论视域下“贵公”思想的主导性。^①

“贵公”思想对于理解中国历史文化具有提纲挈领的意义,它与以个人主义为文化传统的西方社会相区别,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价值观相契合。杜维明针对西方一些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误判,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中提出了中国文化传统核心价值的生命力。他深刻指出,近现代以来,西方文明的冲击造成了极大的偏差。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构在坚实的以个人为主体的原则之下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在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其极端性也致其走上一条不归路。因此,反思现代性,我们必须要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它是由我们的历史、文化、社会所使然之路,但这条路既是中国的,也应该是世界的。也就是说,它源自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轨迹,同时又是开放的;它是世界普遍性中的特殊性,其特殊性中又蕴含着世界的普遍性。^②

第二,中国文化传统的超越性、理想性气质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图景具有某种契合性。文化是人的一种精神土壤,不同的土壤滋养不同精神气质的人。文化又是与社会历史相伴相随而生长、发展的,它具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符号效应。解析中国文化传统的超越性、理想性气质,笔者以为,一方面从儒学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文化传统中可以开掘出丰富的思想。在儒家思想中,“仁”所指涉的自我结构是具有开放性和张力的,自我并不是孤立绝缘的,其结构内部就有他者的存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具有同一性,并且是可通达的。这样思考问题的方式与向度,人们就可结成一个自我与天、与人、与物一体的关系,结成一个“和而不同”的社会。孟子所代表的心性之学,是一种对人的重新认识,其超越性体现在它是一种由内向外的开掘与普遍联系的超越。因为人认识了自己的本性就认识了天道,正可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儒家仁爱之“仁”内含着

同情,具有无限的精神张力。把他人看成与我同类,这是人类最重要的一种“自觉”,即最重要的自由意志,正是以这个“自觉”为基础,人的同情心才可以释放,而同情是普遍存在的,多维度、多样式的。“因此自我认同本身必须有一种关爱之情,这也就是从儒家传统里面提出来的恻隐之情与关爱之情。”^③

汉学家艾恺对于梁漱溟与中国文化的追踪研究,可谓贯穿他的学术人生。他认为,梁漱溟提出的三种文化“理想典型”,表现出人的“意欲”面对环境障碍的三种不同方向,他还将梁漱溟对文化的这一阐释看作是对历史的“后设推测”。他从文化比较的历史视野出发,以历史演进的事实分析了东西文化精神带来的不同的文明形态,指出在现代,西方以“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启蒙人类的意志,将西方文化自私自利与理性计算两大基本倾向结合在一起,征服自然环境,发展出现代化的工业。这种态度本身就蕴含了毁灭人类自己的种子,使人类无法摆脱存在的痛苦与精神的污染。而儒家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基于情感直觉,而非基于智谋计算的态度。中国人既不像西方人那样刺激欲望,征服自然,也不像印度人那样压抑欲望,而是采取和谐与妥协的态度。孔子通过礼乐将人的生活直觉主义化,其意义在于为人类生活创造了精神上的安定,通过审美达到宗教所追求的目的。因此,儒家的生活方式和态度更接近于宇宙永恒直流的真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艾恺作出了这样的历史性判断;中国文化有早熟的性质,即在第一阶段的演化尚未完成前,就已经预见到了隐含其中的第二、第三阶段的问题了。儒家文化解决现代生活隐含的问题比西方文化更有洞见,当人的本性处在人类演化的第一阶段时,西方文化会变成世界文化,而当人类演化进入第二阶段(即经过科技、经济的发展后),中国文化将会变成世界文化。正是中国文化中所谓留天地正气、行心之所安,并非来自上帝诫命或意旨,但其心之

所安之道却超越了个人之现实生命。毫无疑问这种观念包含了超越性的精神,只是与西方不同一出而已。^②

毫无疑问,在马克思学说中,社会主义社会首先是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崇高美好的社会理想,是一个通过不懈奋斗可以实现的理想。尽管在旧中国,广大劳苦大众身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水深火热之中,但马克思的社会理想依然燃起具有超越性、理想性文化气质的中国人之情怀、勇气和一往无前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革命精神确实凝聚了中国文化的这种气质,代表了这种先进的文化精神。

第三,“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哲学不仅在于认识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的实践唯物主义的特质具有某种契合性。“经世致用”作为中国宋代后逐渐形成的一种提倡研究实际问题有益于治理国事的学术思潮,经明清之际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思想家的进一步推动,得到更深入的发展。用今天的话语来表述,就是“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求真务实”、“讲求功效”。这种思潮不仅是对宋明理学某种极致的“反叛”,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反思与继承。

中国文化传统具有致知与力行合一且更强调“行为知功”的特点。朱熹认为,“大抵学问只有两途,致知、力行而已。”^③当然,在理学家那里,他们更关注致知与力行的统一,将之视为“人之两足”。王夫之在批判宋明理学家“以知代行”倾向的基础上指出,“知行统一”是以知行相分、相并为前提的,知有不统行,而行必统知,故行比知更重要。正是基于这种传统,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强调人生实践之智慧,注重哲学家的全人格、全生活及其言行;中国文化的“义理之学”正是连接人的知行,强调人的道德实践之恰当性、应然性的学问,人能自觉依据义理,才可以定是非,以定存心与

行为。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④他并没有否定解释世界的重要性,但提出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更是以“实践唯物主义”作为划清与直观的、感性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区别,强调实践在改造世界中的作用,并由此得出革命的结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⑤

由此可见,在民国初期,中国社会各派无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多少不同,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时尚”被广泛讨论、传播,不能不说与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之特质有关。有研究认为,作为改良派的代表性人物梁启超是在中国明确使用“社会主义”概念的第一人,正是由于他将“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解紧紧地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改良运动的实践结合起来,才促使“社会主义”得以较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革命精神对于渴望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中国人民,必然引起强烈的情感共鸣和精神震撼。因此,这使得先进的中国人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所选择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才可以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尽管这个过程极其艰难曲折,但其历史的车轮将滚滚向前。

小结

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的“结缘”并不是偶然的发现和联结,本文所述的三个历史契合点从共产党人的立场初衷、使命理想和伦理文化的维度,展现了二者内在的具象与交集,蕴含着某种历史选择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并不旨在代表某种理论的结论或历史事态的结果,而在于它昭示的历史发展方向与方法论:其一,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就是人民性;其二,必须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发展生产力,才能实现为人民谋幸福的根本宗旨;其

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在历史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的。

注释:

①②③④⑤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社会主义讨论集》,新青年社,1922年,第46—47、47、34—35、64—65、34—35页。

⑥张君勱等:《科学与人生观》,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13页。

⑦容闳:《西学东渐记》,徐凤石、恽铁樵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78页。

⑧陈红娟:《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主义概念在中国的原初表述、普及化及理解》,《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6期,第45页。

⑨李达:《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讨论集》,第172页。

⑩[美]贾祖麟:《胡适之评传》,张振玉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2年,第15页。

⑪⑬陈红娟:《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主义概念在中国的原初表述、普及化及理解》,《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6期,第49—50、48页。

⑫《新尔雅》是清末民初时期由留日中国学生所编写的新

语词典,主要收录西洋的人文、自然科学新概念、术语。

⑬汪荣宝、叶澜:《新尔雅》,上海:上海文明书局,1906年,第64页。

⑮李达:《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讨论集》,第172—173页。

⑯《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9页。

⑰《李达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1页。

⑱《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60页。

⑲李萍、杨勇:《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公私观及其现代辨析》,《现代哲学》,2020年第5期。

⑳杜维明:《以精神人文主义应对全球伦理困境》,《文汇报》,2017年10月1日。

㉑杜维明:《人类如何走出世俗性的人文主义》,《人民论坛》,2016年第21期。

㉒参见[美]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冀建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0—94页。

㉓朱熹:《答吕子约》,《朱熹集》卷四十八,郭齐、尹波点校,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344页。

㉔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6、48页。

The Historical Correspondence Points in the Marxism Acceptance of the Early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Its Contemporary Inspiration: Re-examination of the "Socialist Debate"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Li Ping Zhang Guan

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ooses and accepts Marxism for three important historical correspondence points. The first point i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Marxism. From the dimension of social history,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to fundamentally solve the problem of China's poverty, weakness and national peril, that is, to let most people live a real "human life". Marxism provides a powerful ideological weapon. The second is between the miss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ideal of "socialism". From the dimension of epistemology, the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Western civilizations since the "Western Learning to the East", th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t theory in China and the revolutionary practice in Russia, all together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correspondence point for early Communists to accept Marxism. The third is between Marxism and the traditional basic values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e dimension of ethical cultur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the core values of "valuing the public", "the temperament of transcendentalism and ideality" and "practical statecraft", while Marxism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ctivism principle, communist ideal and practical materialism, from which we could see the intrinsic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m.

Key words: socialist debat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rxism; historical correspondence points